

# 八年抗戰期間的中美關係

齊錫生主講 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

民國 103 年 5、6 月間國史館舉辦「中國抗日戰爭史—研究回顧與展望」系列工作坊，於 5 月 24 日第二場「戰時內政外交」邀請齊錫生教授到館演講「八年抗戰期間的中美關係」。齊教授以珍珠港事變為分界點將抗戰時期分成兩個階段，由於齊教授的專著《劍拔弩張的盟友：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（1941-1945）》即探討珍珠港事變後的中美關係，因此此次來館演講的重點為 1937 至 1941 年間的中美關係。

齊教授認為抗戰時期的外交關係可分成四個階段，並以四位人物來做代表，依序為胡適、宋子文、史迪威及魏德邁。此四人在各自的政治或軍事舞臺活躍時，正是中美關係進入新階段的時期。齊教授指出，駐美大使，即外交官的性格，會影響到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。以胡適為例，胡適清廉、自愛，但少了外交官應有的手腕與視野，擔任大使期間「不借款、不買武器、不交涉」，所持的態度是「苦撐待變」，也因為如此，喪失了許多與美國政治家來往的好機會。胡適擔任駐美大使期間，不汲汲於向美國人爭取金錢和軍火，且提出「苦撐待變」，這句口號流傳數十年。但齊教授從蔣日記裡發現，在胡適提出這句話前的兩三個月，蔣已在日記裡也說了相同的話並有長篇的解釋，由此也可看出胡與蔣在那時氣息相通、看法一致。當時美國孤立主義的氣氛高漲，因此胡適認為要苦撐，苦撐之後待變，「待」就是要一直等待，這使得胡適有兩項任務都沒有達

成，一是借款；一是把中國和西方各國連結起來對付日本的策略。胡適擔任大使期間所談成的借款，都是顧維鈞談成的，向美國借款可促使美國逐漸向中國靠攏，同時也能以「向美國借到款項」為由，向英、法等國來商談援助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中美關係走上實質的來往。齊教授的看法是，美國慢慢地在中國外交圈裡占據重要位置。

若把顧維鈞與胡適做比較，顧在法國社交圈非常活絡，而胡適則沒有招待過美國政府的官員，是欠缺社交能力的外交家，有想法後就堅信不移地相信這是最好的，因此不論遭遇何種情況，他一定就是堅持「苦撐待變」。只要當時的其他國家能給中國支援，例如德國的武器、蘇聯千百來架的飛機、貸款等，就可以不理會美國，但當德、蘇對中國的態度發生微妙的關係後，中國就必須改變現況。

接著談戰爭的問題。蔣於 1939 年的日記裡有很大的篇幅是他對歐戰的預測、發生時的判斷和展望，這是中國的領袖第一次將外交的視野放到全球的角度。蔣的推論是，由於美國沒有參戰，大家擔心已在歐洲打得焦頭爛額的英、法會向日本屈服，蘇俄也可能因為歐戰的演變而拋棄中國，這些在幾千里外發生的事會影響中國的存亡，因此此時不能只是苦撐待變，而是要「苦撐求變」，必須主動找資源。蔣要胡適主動去請求、去詢問，中國越擔心歐戰會妨礙中國的生存，就越需要胡適向美國總統、國務院說明中國

的擔憂，但胡適卻仍堅持「待變」。簡而言之，胡適借不到款項，又不能把歐戰由弊轉利，因此讓重慶政府覺得這個外交團隊實在沒有作為，只會待變，但重慶政府實在無法再等待。1939 年，日本開始對華戰爭失去耐心，大規模轟炸重慶及其他中小城市。再者，不幸如蔣所料，英、法向日本讓步，不從越南、緬甸運物資進入中國。貸款方面，外幣進入是為了平穩中國的法幣，因此借款的數目必須夠大。由於這幾個重大的內外因素，使重慶政府認為必須換人到美國做事，後來決定由宋子文擔負起此項任務。

宋子文於 1940 年出使美國，其任務有二，一是影響英法兩國在中南半島的決策；一是解決財政的問題，要買飛機對付日軍。蔣將宋子文派到美國的同時，立即寫信給羅斯福，告知以後借款的事請直接跟宋子文商量即可，也要宋子文不必向胡適報告。宋子文是個社交能手，到美國沒多久就和財政部長、軍務部部長聚餐，跟海巡司令坐他的遊艇出海，招待新聞記者，和羅斯福稱兄道弟，連羅斯福的舅舅都有接觸，當要買飛機、要借款時，宋子文一點也不難為情地開口，而這是胡適、陳光甫絕對不願意做的事。宋也不與國務院打交道，財政部長摩根韜（Henry Morgenthau, Jr.）試圖要宋子文收斂，但宋子文不予理會。這是 1940 至 1941 年間中美關係比較新鮮的時期，不同於前期安靜的紳士文雅的作風。前面階段蔣介石很少涉及，後段就涉及較多，因為蔣只

跟宋子文來往電報，不和胡適談。宋子文相對活潑、懂社交，因而較胡適談成了不少借款，因外，由於宋子文頻繁地與美國國會議員等政治家互動、交際，不斷地灌輸美國人一個觀念，即中國人一直在牽制日本，以致於日後珍珠港事變發生時，美國馬上想到中國是其盟友。

1941年以後同樣有兩位標誌性的人物，分別是史迪威（Joseph W. Stilwell）和魏德邁（Albert C. Wedemeyer），他們兩人代表美國對華政策重大的改變。史迪威做為美國利益在中國的代表人，扮演的不是純軍事的角色，外交亦占有極大的比重，齊教授不太認同史迪威是一個很好的戰將或司令，這部分已在齊教授的著作裡有所討論。魏德邁來中國後，則致力於改善中美關係，花了三、四個月的時間建立起密切合作的友好氣氛。

過去五、六十年的中英文著作，焦點多在太平洋戰爭，但是齊教授強調，如果沒有

前四年的歷史，就沒有後四年的成果，前半段，即七七事變起自珍珠港事件，雖是中美關係的相互摸索期，但此四年卻大大地影響了後四年的發展。因為當珍珠港事變發生後，美國直接想到的是在中國大陸的盟友，也就是重慶政權，而中國戰略的布署有時也會跟著美國走，羅斯福的立場、對世界秩序的擺設、對亞洲的規畫等，都是必須考慮的因素，另外很重要的一部份是羅斯福和中國之間的溝通和互動，中國的經驗也會影響羅斯福制定美國政策。珍珠港事變發生後，美國認為只有中國是自己打了 53 個月的國家，必須把中國捧成一個大國，否則美國在太平洋的戰局將不知會如何演變，這是前四年的重要性。若去看這四年的細節、是如何過來的，辛苦的程度，超過《劍拔弩張》所形容的痛苦。齊教授希望大家不要覺得只有後四年是重頭戲，前後四年至少是平等的，還有很多史料能給我們很有趣的啟示。

（紀錄／鄭巧君）